

唐顺之与明代“毗陵诗派”考论^{*}

陈书录

内容提要 从清人吴应奎的“毗陵诗派早知归”一句诗出发，提出并考察了两个问题：一是吴维岳师法的对象是毗陵唐顺之，二是明代嘉靖年间有一个以唐顺之为领袖的“毗陵诗派”。明代毗陵诗派的成员一是弟子雁行而追随毗陵者，二是联轳并驱而羽翼毗陵者，三是地域结缘而认同毗陵者，而“写胸臆”、“新变”等毗陵地域文化与文学是这个流派的凝聚力之一。明代毗陵诗派的理论与创作的特色一是诗宗初唐，风格流丽中有精华；二是取法邵雍，追求“法与理俱妙”；三是提倡“本色”，直抒胸臆，质朴自然。认定明代毗陵诗派，更有利于人们认清明代嘉靖前后诗歌演变的历史，也更有利于人们看到唐顺之在嘉靖诗坛引领“毗陵诗派”而以群体的力量对冲李梦阳为代表的七子派“诗必盛唐”、复古模拟诗风，并大力倡导“直写胸臆”、“本色”等诗学思想，因而在对晚明文学解放思想发挥影响方面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关键词 吴维岳 唐顺之 毗陵诗派 诗学演变

随着弘治、正德年间文坛上占主流地位的“前七子”力倡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①而带来的弊端越来越严重，李梦阳等人也“始悟昔年非”^②，自悔者与其他新变者相互推动，从而在嘉靖前期出现了一股诗风转变的浪潮，这其中有所谓的“初唐体”：“及乎弘治，文教大起，学士辈出，力振古风，尽削凡调，一变而为杜诗，时则有李、何为之倡。嘉靖改元，后生英秀，稍稍厌弃，更为初唐之体，家相凌竞，赋赋盛矣。”^③活跃于当时的“嘉靖八才子”，他们不满李梦阳等“前七子”在宗法秦汉、推崇盛唐中的模拟之风，转而诗法初唐，文宗唐宋，有所谓的“唐宋（文）派”、“初唐（诗）体”。所谓的“初唐体”是从师法对象和时代的角度说的；也有从领军人物和地域的角度来论，认为此时及稍后的诗坛上有一个以唐顺之为首的“毗陵诗派”。那么，嘉靖年间是否有一个与唐宋文派并行的“毗陵诗派”呢？对此，我们有必要加以考论。

“毗陵诗派早知归”——问题的提出与考察

清代诗人吴应奎（1758—1800）在《读明人诗戏效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五首》其二十九中论到他的祖父吴维岳：

少日成名众所希，毗陵诗派早知归。敢因历下持牛耳，遽忘云山旧钵衣。（吴应奎《读明人诗戏效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五首》其二十九^④）

* 本文为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跨学科重大项目“江苏明清文学流派研究”成果之一。

① 《明史》卷二八六《李梦阳传》，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348页。

② 李梦阳《庚午除夕》，《空同集》卷二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2册，第185页。

③ 陈束《苏门集序》，高叔嗣《苏门集》卷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3册，第562页。

④ 郭绍虞等编《万首论诗绝句》，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又，吴应奎著《读书楼诗集》六卷，民国五年吴氏雍睦堂铅印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这首论诗绝句尤其是“毗陵诗派早知归”一句诗，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吴维岳师法的对象，二是明代嘉靖年间有一个“毗陵诗派”。我们先考察前一问题。吴应奎《读明人诗戏效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五首》其二十八中注云：“家中丞峻伯，少受业于毗陵，故诗文多宗法之。”峻伯是吴维岳的字。吴维岳，孝丰人，生于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卒于明穆宗隆庆三年（1569）。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知常州府江阴县，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以诗名于世。吴应奎论诗绝句中的“毗陵”指谁呢？《明史》卷二八七《王慎中传》说：“（王慎中）与顺之齐名，天下称之曰王、唐，又曰晋江、毗陵。”唐顺之为明代常州府（古称毗陵）武进县人。显然，“毗陵诗派早知归”的本意是说吴应奎的祖父吴维岳早在明代嘉靖年间就归依毗陵诗人唐顺之。这在吴维岳的弟子汪道昆的《明故中宪大夫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霁寰先生吴公行状》中也得到印证：“（吴维岳）师事毗陵唐太史应德。”^①因而，杨钟羲《雪桥诗话》三集卷九中指出：

明孝丰吴峻伯中丞维岳，少受业于毗陵，以诗振起嘉靖间，与李先芳辈结社西曹。初与王元美为同舍郎，实弟畜之，弇州尝云：“峻伯首进我于社。”厥后历下门户浸盛，诗宗北地，号“王、李”，持论不相洽。元美作诗评，与先芳均置之“广五子”中，而太函为峻伯所取士，反跻而上之。其评峻伯诗则云：“如子阳在蜀，亦有威仪；又如初地人见声闻，则进见大乘则小。”峻伯颇不平之。裔孙应奎蘅皋诗：“少日成名众所希，毗陵诗派早知归。敢因历下持牛耳，遽忘云山旧钵衣。”^②

这也有“夫子自道”，吴维岳有《病起南行呈荆川业师》（《天目山斋岁编》卷二）、《寄呈荆川先生》（卷六）、《别荆川先生后泊锡山作》（卷一六）、《晚泊武进，荆川唐先生携储张二道人轻棹过访，述陈一首》等诗，后者云：

小艇琴书烟浦深，毗陵秋月幸追寻。几年龙卧同巢许，一意仙游学向禽。道吕同参眉宇气，斋居翻识市城心。独怜樗散趋微禄，犹抗尘容领德音。^③

吴维岳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所写的《寄呈荆川先生》中说：“愧立门墙频岁月，终然顽劣一无如。”^④又据唐鼎元《荆川弟子考》中说：“峻伯（吴维岳字峻伯）师事荆川公，当在嘉靖十三、四年（1534、1535），荆川公官翰林时。在弟子中为最早矣。”显然，吴维岳是唐顺之弟子中最早归依者，所谓吴维岳“毗陵诗派早知归”，并非虚妄之言。

所谓吴维岳“毗陵诗派早知归”的事实，并非仅仅是清代乾隆年间的吴应奎在二百多年后追认的，而且是明代后七子领袖李攀龙、王世贞在嘉靖年间早就肯定的。王世贞在《吴峻伯先生集序》中说：“峻伯（吴维岳）数使候于鳞（李攀龙），辄谢病不复见。余得交关其间，以谓于鳞，于鳞曰：‘夫是膏肓者，有一毗陵在，而我之奈何？为我谢吴君，何渠能舍所学而从我？’峻伯不尽然，曰：‘必是古而非今，谁肯为今者？且我曹何赖焉。我且衷之。’故峻伯卒而新都汪伯玉（汪道昆）著状云：‘济南（李攀龙）以追古称作者，先生（吴维岳）逡逡师古，然犹以师心为能。其持论宗毗陵，其独造盖有足多者。’所谓毗陵，则武进唐应德也。”^⑤显然，正因为“有一毗陵在”即唐顺之与吴维岳的师生关系存在，吴维岳便与李攀龙等人分道扬镳，而且二者的分歧很大，在李攀龙看来吴维岳已是病入“膏肓”，无可挽救。二者分歧的关键是以李攀龙等人“是古非今”，而吴维岳“持论宗毗陵”而“以师心为能”。说吴维岳与李攀龙的分歧是“是古非今”或“以师心为能”的汪道昆，既是吴维岳的弟子，也被后七子领袖王世贞列为“后五子”之一，应该是当时双方的知情者，其言应是真实可信的。而且，从“后七子派”领袖李攀龙多次拒绝见吴维岳的言行来看，多少流露出一些派别意识，这也为后来吴应奎有关吴维岳“毗陵诗派早知归”的诗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可见，吴应奎《读明人诗戏效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五首》其

① 汪道昆《太函集》卷四一，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877页。

② 《雪桥诗话》三集卷九，《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24集，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第240册，第1042—1043页。

③ 《天目山斋岁编》卷一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5册，第235页。

④ 《天目山斋岁编》卷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5册，第178页。

⑤ 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五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2册，第664页。

二十九中以“敢因历下（李攀龙）持牛耳，遽忘云山旧钵衣”二句，说明吴维岳归依“毗陵诗派”是在当时李攀龙、唐顺之的派别之争中的必然选择。

所谓吴维岳“毗陵诗派早知归”的事实，不仅表现在文学主张上，也表现在诗歌创作上。

嘉靖三十年（1551），三十八岁的吴维岳在牡丹花开的春天，前往宝应县访友人朱曰藩，写了一首《宝应湖即事》诗：“远水映空浮，星分芦荻洲。鱼虾湖上饭，萧鼓雨中舟。击楫成孤咏，扬帆出乱流。春还信可乐，前路是扬州。”^①首联写远水高空交映下的宝应湖之景，一片空灵；颌联和颈联写雨中湖上分享鱼虾、击楫高咏的舟中之人，悠然自得；尾联写诗人荡舟游湖而怀想扬州，一股乐春乐水之情油然而生：“春还信可乐”。这种平易流畅、空灵清新之风，在吴维岳诗集中多有所见，如：“关河春雁少，风雨暮钟多”；“细雨来因晚，空山到已秋”；“清飙凉带叶，零雨细沾沙”；“乱水穿林响，残星缀岭低”；“剪藤舒柏树，芟草出瓜苗”；“暮雨初收市，秋江正长潮”；“潮生风听急，江远雨看无”；“涧水斜牵筏，林烟远出村”；“沙头飞燕子，市上买樱桃”；“钟残寒雨外，雁没远烟中”等^②。因而，李维桢在《吴中丞集序》中说：“先生故有《天目山斋岁编》，自弱冠登第，以迄纳节还山，所吟咏唱和具在，日有精诣，即七子时相及而终不相囿，卓然自为一家。深而出之以淡，详而持之以约，阔而律之以整，华而根之以实。”^③显然，吴维岳的诗风不为李攀龙等人师古摹拟、雕缕彩绘的诗风“相囿”，“卓然自为一家”；而是与唐顺之“质不伤文，丽而有体”^④的诗风相靠近。这些，都印证了有关吴维岳“毗陵诗派早知归”之说。

当然，吴维岳师法唐顺之，两人只是形成师生关系，至于唐顺之是否领头形成“毗陵诗派”，换句话说明代嘉靖年间是否有一个“毗陵诗派”，尚有待于进一步考察。

明代毗陵诗派成员考

一个诗派的形成，往往应有大体相同的文学主张与创作实践；也应有流派领袖与诗人群体。我们先考察后者。当时围绕着唐顺之的诗人群体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一是弟子雁行而追随毗陵者。如同唐代韩（愈）门弟子对于韩孟诗派，明代李（东阳）门弟子对于茶陵派，清代袁（枚）门弟子对于性灵派、姚（鼐）门弟子对于桐城派的形成一样，明代中期唐（荆川）门弟子对于毗陵诗派的形成也起了重要作用。据唐鼎元（1894—1988）等的《荆川弟子考》及《补遗》，共列出唐门弟子六十一人，除前文所说的吴维岳之外，其中重要的是：

万士和（1516—1586），字思节，号履庵，明常州府宜兴人。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刻有《二妙集》，著有《履庵集》十二卷，其中诗词三卷，文九卷。《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七《履庵集》提要中指出：“盖士和受业唐顺之，能不染七子雕绘之习。”^⑤姜宝在《履庵万公集序》中指出：

吾师荆川先生入馆局之初，尝学西汉为文，学初唐、中唐为诗。其晚年所取文，乃司马温国公，谓其质任自然，不求为西汉而未尝不西汉；诗取邵尧夫，谓其本性而得之乎天机之自动，不肖似风云月露之形，然未尝无吟风弄月之趣味。盖诗文在人，有至有不至，有人与文并至者，有人不至而文至者，两公之作则所谓人文并至者也。故先生有取焉。而吾友履庵万公（万士和）其所作实似之。……予与公同游师门，两人者尝并为师门所称许。^⑥

① 《天目山斋岁编》卷一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5册，第210页。

②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一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9页。

③ 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一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0册，第568页。

④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一二，第331页。

⑤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七，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93页。

⑥ 姜宝《履庵万公集序》，《万文恭公摘集》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9册，第196—197页。

万士和有《游龙池次荆川先生旧韵二首》^①、《戏咏荆师射》、《再咏荆师射二首》、《寄荆川师》^②等诗,和《上唐荆川尊师》、《再上唐荆川尊师》、《三上唐荆川尊师》^③、《祭荆川先生文》^④等文。又有《乡人有谓荆川师集中无仆名字者,诗以见意》诗,其一云:“廿年立雪待师门,百病难消愧钝根。往日是非希一盼,平生礼拜在无言。文章悟后皆刍狗,身世忘来只本源。幸此还期分席坐,姓名不挂更何论。”其二云:“同门诸士独吾愚,沾腹残膏一卷书。望海始知秋水小,疑冰却笑夏虫拘。遗珠索也还谁得,真诀参来总不如。卅年无闻心又懒,敢将骥尾附名儒。”^⑤与之相互映照的是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四部丛刊初编》本)中有《万思节以集中无名作诗见贻二首》(卷三)、《万思节工于诗而近又学谢次韵答之》(卷三)、《与万思节主事》两则(卷七)、《与万思节佾事》(卷七)、《答万思节参政》两则(卷八)等。《万思节工于诗而近又学谢次韵答之》中有云:“衣钵寂寥吾且老,文章锻炼子能工。”有意传授衣钵与赏识弟子之情跃然其间。

姜宝(1514—1593),字廷善,号凤阿,丹阳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累官吏部尚书。有《姜凤阿先生文集》。汪道昆在《姜凤阿先生文集序》中说“是时毗陵公以其学鸣于野,先生抠衣从之。……先生为毗陵高第弟子”^⑥,可见姜宝归依唐顺之且为其高足。上文所引姜宝的《履庵万公集序》中也说他自己与万士和“同游师(唐顺之)门,两人者尝并为师门所称许”^⑦。《荆川先生文集》卷六中有《与姜廷善编修书》。

莫如忠(1509—1589),字子良,号中江,明松江府华亭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官至浙江布政使。为诗尤工近体,有《崇兰馆集》,诗风清令,蔚有唐风。他在《祭唐荆川先生文》中说:“忠自弱冠挟策神京,偶蒙品藻,雅窃师承,溯及门之有日,惭竟晚而何成,惟德音之在耳,庶终身而服膺。”^⑧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卷一中有《送莫子良擢举东归》、《赠南都莫工部子良夏至斋宿署中》等。对于唐顺之与莫如忠的师生关系及莫如忠在唐顺之影响下的诗文创作,茅坤在《中江先生文集序》中评论说:“而予同年莫方伯中江先生,今海内名流也。少尝师事唐武进公,故一切宦游所向,并以经术饰吏治,出处进退,崭然不失尺与寸。其所发之为诗歌文章之什,并本之仁心质行,而机杼独出。”^⑨

姚翼,原名应爵,字翔卿,号海屋,归安人。著有《玩画斋杂著编》八卷。茅坤《海屋君传》中说:“予与君少共事唐一庵先生,已而予释褐后力攻古文辞,间从武进唐荆川游。君亦复改事武进公。……君既谒武进公,亦稍为入室弟子,尽得其折中六艺以来文章者之旨。”^⑩

安如石,字子介,无锡人。《荆川先生集》卷七中有《与安子介书》。嘉靖二十八年(1549),安如石等人谋划为唐顺之刊印文集,请王慎中作序,王慎中在《荆川先生集》卷首序中说:“无锡安生如石子介,慕君之学,得其诗文,汇而刻之,以与同好者共。安生之趣尚如此,岂凡人之所及哉!”^⑪当时唐顺之四十三岁,可见安如石等人对唐顺之的仰慕之情,而且此种汇刻之举对唐顺之诗文的传播与扩大毗陵诗派的影响功不可没。

① 《履庵文集》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9册,第216页。

② 《履庵文集》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9册,第219页。

③ 《履庵文集》卷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9册,第330—333页。

④ 《履庵文集》卷一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9册,第412—413页。

⑤ 《履庵文集》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9册,第217页。

⑥ 《姜凤阿先生文集》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7册,第444页。

⑦ 《履庵文集》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9册,第197页。

⑧ 《祭唐荆川先生文》,《崇兰馆集》卷二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5册,第61页。

⑨ 《崇兰馆集》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4册,第380页。

⑩ 《茅坤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8页。

⑪ 《荆川先生集》卷首,《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明刊本。

二是联镳并驱而羽翼毗陵者。嘉靖年间,唐顺之与一些文人结为群体,是所谓的“嘉靖八才子”,李开先在《吕江峰集序》中指出:“今嘉靖十年后,更有‘八才子’之称。八人者,迁转忧居,聚散不常,而相守不过数年,其久者亦止八九年而已。不知天下何以同然有此称?”^①《明史》卷二八七《陈束传》中也说:“时有‘嘉靖八才子’之称,谓束与王慎中、唐顺之、赵时春、熊过、任瀚、李开先、吕高也。”其中王慎中、赵时春为嘉靖五年(1526)进士,唐顺之、李开先、吕高、陈束、任瀚、熊过为嘉靖八年(1529)进士,赵时春与唐顺之分别为会试第一,而唐顺之以二甲第一人登进士第,在中进士的“八才子”中名次最高,享有很高的声誉。“八才子”中进士后,王慎中授礼部主事,赵时春选翰林院庶吉士,唐顺之授兵部主事,李开先授户部云南主事,吕高授户部主事,陈束授礼部主事,任瀚授吏部主事,熊过授兵部武选司主事,都任职郎署或翰林院,相聚京城数年,其中“久者亦止八九年”。这数年的相聚,其中重要的活动内容是“陈说艺文”。张时彻在《陈约之传》中说陈束任礼部主事及翰林院编修后,“乃日与屠文升、唐应德、田叔禾、王道思三数子者更相过从,考镜鸿蒙,陈说艺文,侈论宏议,至达不休。倦则便相枕卧,率以为常”^②。而且他们常“作诗会”:“先生(李元阳,号中溪)既迁户部主事,与翰林常州唐顺之、浙陈束、屠应竣、吏部郎山东李开先、蜀任瀚、熊过、闽王慎中作诗会,时号十才子。”^③常“作诗会”的有“嘉靖八才子”,再加上李元阳、屠应竣,为“嘉靖十才子”。李元阳、屠应竣都是嘉靖五年进士,也都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其实,在“嘉靖十才子”之外,还有一些与唐顺之一道“陈说艺文”、“常‘作诗会’”而诗学初唐者,胡应麟《诗薮》中指出:“嘉靖初,为初唐者,唐应德、袁永之、屠文升、王汝化、任少海、陈约之、田叔禾等。”^④袁袞,字永之,吴县人。嘉靖五年以二甲第一名登进士第,选翰林院庶吉士。著有《胥台稿》。王格,字汝化,京山人。嘉靖五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著有《少泉集》。田汝成,字叔禾,仁和人。嘉靖五年进士,授南京刑部主事。又当时有“三翰林”之说,除了“嘉靖十才子”中唐顺之、赵时春之外,还有罗洪先(号念庵,嘉靖八年进士,廷试第一,授翰林院编修),耿定向《先进遗风》中说罗洪先“官春坊进讲,与其友唐荆川顺之、赵汝谷时春居相比。……由是三公交好浸密,日相期许以天下自任,中外咸称异之,曰‘三翰林’云”^⑤。还有洪朝选(1516—1582,嘉靖二十年进士)等人,不与“嘉靖八才子”或“嘉靖十才子”及“三翰林”之列,但与唐顺之等实是联镳并驱:“时王思道、唐应德辈,锐意古文辞,舜臣(洪朝选,字舜臣)虽不与八才子之列,而实联镳并驱。”^⑥他们“联镳并驱”中选择的共同方向是摆脱李梦阳等前七子“诗必盛唐”、复古摹拟之风,师法对象“一变为初唐”:“正、嘉之间,为诗者踵何、李之后尘,剽窃云扰,应德(唐顺之)与陈约之(陈束)辈,一变为初唐,于是称其庄严宏丽,咳唾金璧。”^⑦

在“嘉靖八子”(“嘉靖十子”)及其他联镳并驱的群体中,从诗歌“一变为初唐”方面来说,表现突出的是唐顺之、陈束,被称为“应德与陈约之辈”。但当时及稍后的论者大多以唐顺之最为突出:“有为王、李所摈斥,而识见议论卓有可观,一时文人望之不见其崖际者,武进唐荆川是也。”^⑧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四不可忽视:一是在明代科举社会之风炽热的大背景下,在以进士出身者组合而成的群体中,往往以功名等第最高者最引人注目,罗洪先虽然廷试第一(状元),但他以理学著名,早就以诗歌著名的唐顺之会试第一,又以二甲第一人登进士第,在中进士的“嘉靖八才子”中名次最高,

① 《李中麓闲居集》卷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92册,第560页。

② 张时彻著《芝园定集》卷三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82册,第225页。

③ 李选《荆州府知府中溪李先生元阳行状》,焦竑编《献征录》卷八九,上海书店1986年版(影印),第3856页。

④ 胡应麟《诗薮》续编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63页。

⑤ 耿定向《先进遗风》卷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1册,第400页。

⑥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一二,第352页。

⑦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唐金事顺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75页。

⑧ 袁宏道《叙姜陆二公同适稿》,《袁宏道集笺校》卷一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95页。

享有很高的声誉；二是在唐宋文派中，以“王、唐”而著名，唐顺之是唐宋文派中的领军人物，在与之相辅相成的诗人群体中，也就很容易被视作领军人物，当然他的诗歌主张与诗歌创作的实绩（下文将专门论述）起着关键作用；三是陈束所学不及唐顺之：“（陈）束与唐顺之为同年，其倡为初唐、六朝之作，以矫李、何之习，而所学不逮顺之。”^①四是虽然在嘉靖诗坛上称“应德（唐顺之）与陈约之（陈束）辈”，但陈束于嘉靖十九年（1540）就英年（三十三岁）早逝，而唐顺之直到嘉靖三十九年（1560）病卒，时年五十四岁，在文坛上活跃的时间比陈束多出整整二十年。

那么，为什么在论到唐宋文派时称“王、唐，又曰晋江、毗陵”，而在论到诗人群体时仅仅突出唐顺之（“毗陵”）呢？“嘉靖八才子”之一的李开先《市井艳词又序》中作出了回答：“唐荆川（唐顺之）之于诗，王南江（王慎中）之于文，方两江（方元焕）之于书，予之于词，其事异而理同，致百而虑一者乎！”^②这是因为“综其（王慎中）全集之诗与文相较，则浅深高下，自不能掩。文胜之论，殆不尽诬。”^③由于王慎中文胜于诗，诗较浅下，因而“评明人诗者，不及王道思（王慎中，字道思）”^④。因而，在嘉靖诗坛上，“识见议论卓有可观，一时文人望之不见其崖际者”^⑤而成为一个诗人群体的领军者，是毗陵唐顺之。至于王慎中、赵时春、李开先、吕高、陈束、任瀚、熊过、李元阳、屠应埈、田汝成、袁袞、王格、罗洪先、洪朝选等新科进士、翰林和郎署少壮派则为其羽翼。

三是地域结缘而认同毗陵者。“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地域结缘，既包括土生土长者对家乡的亲近之情，也包括客居流寓者对第二故乡的认同之感。亲近之情、认同之感往往与地域文化、文学密切相关，而尚文之乡的毗陵（常州）更增强了人们的亲近之情、认同之感：“毗陵，人文一都会也，其间以诗鸣者，前后相望。”^⑥从吴公子季札到齐梁萧氏文学家族，从唐代曾为常州刺史并有《毗陵集》的独孤及到宋代晚年定居常州而病逝的苏轼，从明代常州府武进的唐顺之到清代的常州词派、阳湖文派、毗陵诗派等，真所谓以诗文鸣者“前后相望”。这些文化名人、文学名家，光大了常州（毗陵）地域文化，大大增强了人们对常州（毗陵）地域文化的亲近之情、认同之感。例如，当唐顺之于嘉靖八年（1529）进士及第后，早在正德六年（1511）进士及第的武进（属常州府）乡先辈毛宪（1469—1535）致书唐顺之，贺其得中高第（会试第一，廷试第四）：“顷闻高第，大为吾常州之光，深以为喜。”^⑦正是这种地缘文化的亲近之情，明代嘉靖年间常州（毗陵）籍一批文人对于“大为吾常州之光”的唐顺之多有认同感。如白悦（1498—1551），字贞夫，号洛原，明常州府武进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授户部陕西司主事，后以尚宝司司丞致仕。著有《洛原遗稿》八卷。唐顺之曾在《祭白洛原文》中追叙他与白悦的乡谊与宦情：“及愚父子蒙先人之业，复与公仕途而相邂逅，禁门钟漏几回，联佩而追踵；乡园花月累岁，殷勤乎杯酒。”^⑧他们曾一道讨论风雅，陈说艺文，振兴诗道，皇甫汈在《白洛原遗稿序》中写道：“海内操觚秉槩之士，云集京丘，君与之讨论风雅，讥评甲乙，诗道益振焉。”^⑨便是当时情景的写照。又如薛应旂（1500—1557后），字仲常，号方山，明常州府武进人。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著有《方山薛先生全集》。薛应旂以理学著名，但他的诗歌也颇有特色，崔铣在《题薛子诗稿》中说薛应旂的诗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七《陈后岗诗文集》提要，第1584页。

② 《李中麓闲居集》卷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92册，第578页。

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遵岩集》提要，第1504页。

④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一二“王慎中”条，第330页。

⑤ 袁宏道《叙姜陆二公同适稿》，《袁宏道集笺校》卷一八，第659页。

⑥ 彭会淇《毗陵六逸诗钞序》，《毗陵六逸诗钞》卷首，康熙五十六年寿南堂刻本。

⑦ 《与唐应德》，《古庵毛先生文集》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7册，第445页。

⑧ 《荆川先生文集》卷一三。

⑨ 皇甫汈《皇甫司勋集》卷三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5册，第752页。

“颤发情理，融会风雅，迨苏、李、曹、刘以下及唐诸家，靡不通贯。”^①薛应旂著有《方山薛先生全集》六十八卷，其中有《与唐荆川》、《祭唐荆川》、《六朝诗序》（辑《六朝诗集》五十五卷）等文，和《得唐应德书怅然有作》、《寄唐荆川》等诗。唐顺之的《荆川先生文集》中有《次韵赠薛仲常》（卷三）、《与薛方山郎中》（卷五）等。又如王立道（1510—1547），字懋中，号尧衢，明常州府无锡人。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著有《具茨诗文集》。王立道为唐顺之的妹婿，唐顺之在《王冢妇唐孺人墓志铭》中说唐孺人是“编修王懋中立道之妻，而余顺之之妹也”^②。王立道有《寄赠唐荆川二首》、《芳洲为袁御医题和唐荆川二首》^③等诗。王立道的诗歌有其妻兄之风，《四库全书总目·具茨集》中说：“其诗虽微嫌婉弱，而冲容淡宕，不为奇险之语，犹有中唐钱、刘之遗。”^④

客居流寓（包括为常州地方官）者的地域结缘，也体现在对唐顺之的认同感上。如杨巍（1517—1608），字伯谦，号梦山，海丰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授武进知县。官至吏部尚书。著有《梦山存家诗稿》八卷。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说杨巍“嘉靖庚戌进士，知武进县。……卜居桃花岭下，延至四方文士，诗酒酬和，其诗多俊拔之致，李中麓（李开先）诸人咸推之”^⑤。又如吴维岳虽然是“毗陵诗派早知归”，而知常州府江阴县，更是加深了对毗陵地域文化与唐顺之的认同感。他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写的《晚泊武进，荆川唐先生携储张二道人轻棹过访，述陈一首》诗中说：“小艇琴书烟浦深，毗陵秋月幸追寻。……独怜樗散趋微禄，犹抗尘容领德音。”^⑥还有“嘉靖十才子”中的李元阳、王慎中到常州地方任职，也是如此。李元阳（1493？—1580），字仁甫，号中溪，云南大理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曾为常州府江阴令。著有《中溪集》。李选《荆州府知府中溪李先生元阳行状》中说：“（李元阳，丁忧）服阙，补江阴。……先生赋诗作文，初不经意，援笔辄就，世以为唐白香山、宋苏东坡拟之。”^⑦王慎中于嘉靖十三年（1534）谪常州通判，后又为常州府江阴县令，与毗陵结下不解之缘，他在《将至毗陵一首》诗中写道：“人吏遥相候，江山若有情。”^⑧唐顺之也于嘉靖十四年（1535）削籍归里，多与王慎中往来，相互赠答唱和，在思想与诗歌等方面加强了相互之间的交流，俞宪《盛明百家诗·王参政集·序》中说：“（王慎中）与故友荆川唐君善，尝同荆川访余山馆，酌山寺之大佛殿中，酒酣，投壶较射，联句赋诗，颇有轻世自得之态。”

明代嘉靖年间之所以能将这么多诗人凝聚成毗陵诗派，既有毗陵名家唐顺之的领袖作用，也有特色鲜明的毗陵地域文化的吸引力。毗陵的人文渊源，可追溯到三让王位的谦谦君子吴公子季札。毗陵文化的兴盛期是南朝齐梁时期，萧氏家族中有四十多人留下著作，涌现出萧子良、萧子云、萧统、萧绎等一批成就卓著的学者、文学家、书画家、音乐家，特别是萧统编纂的《文选》在中国文化与文学史上影响十分深远。明代毗陵（常州）出现科考之盛，据《毗陵科第考》记载，明代仅嘉靖年间，毗陵（常州）考取进士三十九名^⑨，其中唐顺之为嘉靖八年（1529）进士榜中的二甲第一名。毗陵文化的土壤孕育出地域文学的奇葩，有所谓“诗派今属南兰陵”^⑩之说。南朝齐梁南兰陵（常州）萧氏家

①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首，《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43册，第5页。

② 《王冢妇唐孺人墓志铭》，《荆川先生文集》卷一五，《四部丛刊初编》本。

③ 《具茨集》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77册，第694页。

④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具茨集》提要，第1507页。

⑤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杨官保巍”，第546页。

⑥ 《天目山斋岁编》卷一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5册，第235页。

⑦ 李选《荆州府知府中溪李先生元阳行状》，焦竑编《献征录》卷八九，第3856页。

⑧ 《盛明百家诗》中的《王参政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05册，第707页。

⑨ 《毗陵科第考》卷四，赵充之编，同治七年刻本。

⑩ 查慎行《题毗陵徐思肖诗卷后四首》其三，《敬业堂诗集》卷四六，《四部丛刊初编》本。

族群体,开创了毗陵乃至齐梁两朝文学的新局面,如萧统明确提出“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①的文学标准并编纂《文选》,萧子显力倡“若无新变,不能代雄”^②文学革新的观点,简文帝萧纲成为宫体诗的创始人之一。“唐宋时期,常州涌现出许多优秀的诗人,如萧颖士、张昺、胡宿、丁宝臣、孙覿、张纲、邹浩、张守等”^③,还有在常州为地方官的著名文士,如唐代常州刺史独孤及著有《毗陵集》,宋代常州知府王安石、曾十一次来常州最后终老于常州的苏轼等,后两位都是享誉海内外的大文豪,对唐顺之和明代毗陵诗人群体颇有影响,如唐顺之在《读东坡诗戏作。东坡卒于武进顾塘桥,去余家几十步》诗中写道:“公诗句句写胸臆,一滴水成大海翻。……异代或疑后身在,告终此地招其魂。”^④正是“写胸臆”、“新变”等毗陵地域传统文学的特色,吸引着唐顺之和以他为领袖的诗人群体。可见,明代嘉靖时期的毗陵诗派不仅因为其领袖唐顺之为毗陵(常州)人士,而且其凝聚力之一是富有特色的毗陵(常州)文化与文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明代嘉靖时期的毗陵诗派是一个带有地域色彩的诗派。

明代毗陵诗派的理论与创作的特色

一个诗派,应该有领军人物与羽翼者群体,更要有颇为鲜明的文学主张与诗歌创作的特色。因而,我们有必要考察明代毗陵诗派的特色。

一是诗宗初唐,风格流丽中有精华。唐顺之的弟子姜宝指出:“吾师荆川先生入馆局之初,尝学西汉为文,学初唐、中唐为诗。”^⑤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中也说:“盖荆川初入馆局,诗学初唐。”^⑥唐顺之嘉靖八年(1529)进士,授兵部武选司主事。其后因母病乞归,母丧服阕后起授吏部主事,嘉靖十二年(1533)七月改入翰林院为编修。从此开始,他的诗学初唐,兼及中唐,也兼及六朝:“(陈)束与唐顺之为同年,其倡为初唐、六朝之作,以矫李、何之习。”^⑦唐顺之宗法初唐并兼及六朝、中唐之诗,不少写于翰林院任职之时,如《奉天殿庆成侍宴》、《同院寮观阁中芍药作》、《南苑》、《午夜庭宴》、《和陈编修约之禁中雪诗二首》^⑧等。如《和陈编修约之禁中雪诗二首》其一云:“建章今旦满清辉,朔雪缤纷应候飞。忽飘九陌从风散,渐积千门待日晞。素影偏摇宫女扇,轻花欲上侍中衣。最是相如能献赋,沾恩新向菟园归。”首联以汉代建章宫借代明朝宫殿,写朔雪缤纷,清辉照宫殿,将宫殿的静态之景转化为动态之景;颔联由宫殿转向“九陌”、“千门”,视野开阔;颈联又将视角转到宫女、朝官,“素影偏摇”、“轻花欲上”等拟人化的写法,给禁中的宫女、朝官注入了些许生气;尾联用汉代司马相如向梁孝王献赋的典故,借司马相如向梁孝王献《梁王菟园赋》(载于《古文苑》中的《梁王菟园赋》,有人认为是伪作)而得恩宠说自己颇受朝廷恩泽,其中也反用中唐诗人彭伉《寄妻》诗中的“莫讶相如献赋迟,锦书谁道泪沾衣”^⑨句意。又如“榴吐千花承羽盖,萸开五叶拂瑶墀。冰盘错出仙人掌,金缕遥分织女丝”^⑩、“玲珑玉佩花间映,摇曳罗衫叶下迷。花间叶下情无极,含笑含娇似相识”^⑪等,在受初唐及六朝绮丽之风影响的同时而“质

① 萧统《文选序》,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页。

② 萧子显《南齐书》卷五二《文学传论》,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908页。

③ 纪玲妹《清代毗陵诗派研究》,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④ 《荆川先生文集》卷三。

⑤ 姜宝《履庵万公集序》,《万文恭公摘集》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9册,第196页。

⑥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一二“万士和”条,第352页。

⑦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七《陈后岗诗文集》提要,第1584页。

⑧ 以上诗见于《荆川先生文集》卷一。

⑨ 《全唐诗》卷三一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595页。

⑩ 《午夜庭宴》,《荆川先生文集》卷一。

⑪ 《同院寮观阁中芍药作》,《荆川先生文集》卷一。

不伤文，丽而有体”^①。因而，唐顺之也成为嘉靖年间宗法初唐诗的翘楚。

当时，诗宗初唐者不仅仅是唐顺之，而是有一个诗人群体，胡应麟《诗薮》续编卷二中指出：“嘉靖初，为初唐者，唐应德、袁永之、屠文升、王汝化、任少海、陈约之、田叔禾等。”^②其中如屠应竣（字文升）的诗歌“取材六代，具体初唐，烂若春葩，将以秋实，是众作之有滋味者”^③。《皇明诗选》卷六中李雯对屠应竣的评语是“风姿闲丽，如玉树风前，是户庭佳物”^④。陈束“与唐顺之为同年，其倡为初唐、六朝之作，以矫李、何之习”^⑤。这位青年诗人深受“初唐四杰”和“沈、宋”的影响，其诗时而流丽，时而秾艳，时而秀润，时而也有精丽典重之作，如《送寮友朝长陵》等。虽然没有被胡应麟《诗薮》列入“嘉靖初为初唐者”之中的王慎中，其五言古诗“文理精密，足以嗣响颜、谢”^⑥。还有与唐顺之颇有交谊的胡直^⑦等诗人，明确在诗题上标举初唐体：《金陵曲初唐体》、《忆昔行寄陈廷评初唐体》、《君莫悲行赠人初唐体》^⑧。正如陈束所指出的：“嘉靖改元，后生英秀，稍稍厌弃（李、何宗杜复古之风），更为初唐之体，家相凌竞，斌斌盛矣。”^⑨在嘉靖初期“斌斌之盛”的宗法初唐的诗坛之风中，首推唐顺之的律体诗，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就是如此说的：“嘉靖初，为初唐者……律体精华，必推应德（唐顺之）。”^⑩

二是取法邵雍，追求“法与理俱妙”。唐顺之的诗歌创作上有前期与后期的转变，他的弟子姜宝《履庵万公集序》中指出：“吾师荆川先生入馆局之初，尝学西汉为文，学初唐、中唐为诗。其晚年所取文，乃司马温国公，谓其质任自然，不求为西汉而未尝不西汉；诗取邵尧夫，谓其本性而得之乎天机的自动，不肖似风云月露之形，然未尝无吟风弄月之趣味。”^⑪但王世贞则认为唐顺之从诗宗初唐转而为取法邵雍，是在中年，所谓“中年忽自窜入恶道”^⑫。王世贞虽然对唐顺之贬之过分，但他有关唐顺之中年转变诗风说较为接近事实。因为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也就是唐顺之三十六岁时他就在《与王遵岩参政》中论邵雍诗：

不会兄于武陵，终是此身不了心事。三年之间，定当发兴耳。近来有一僻见，以为三代以下之文，未有如南丰；三代以下之诗，未有如康节（邵雍，字尧夫，谥康节）者。然文莫如南丰，则兄知之矣，诗莫如康节，则兄亦且大笑。此非迂头巾之说，盖以为诗思精妙，语奇格高，诚未见如有康节者。知康节者莫如白沙翁，其言曰：“子美诗之圣，尧夫更别传。后来操翰者，二妙罕能兼。”此犹是二影子之见。康节以锻炼入平淡，亦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者矣，何待兼子美而后为工哉。^⑬

这说明此时的唐顺之已从早年以诗宗初唐而对冲李梦阳等七子派诗宗盛唐的杜甫，到中年则转而为以诗宗北宋的邵雍对冲李梦阳等七子派诗宗盛唐的杜甫，盛赞邵雍“诗思精妙，语奇格高”、“以锻炼入平淡”的诗风。唐顺之还与他的弟子万士和将陈献章有关邵雍诗的“二妙”（法与理俱妙）说具体化，

①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一二“唐顺之”条，第331页。

②⑩ 胡应麟《诗薮》续编卷二，第363页。

③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一二“屠应竣”条，第326页。

④ 陈子龙等《皇明诗选》卷六，明崇祯十六年刻本。

⑤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七《陈后岗诗文集》提要，第1584页。

⑥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一二，第330页。

⑦ 胡直，字正甫，号庐山，江西泰和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嘉靖三十三年（1554），唐顺之访胡直于句容，胡直有《唐荆川先生视师海上奉赠二首》、《书唐荆川夷斋庙诗后》等，见于《衡庐精舍藏稿》卷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7册，第274、453页。

⑧ 《衡庐精舍藏稿》卷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7册，第253—255页。

⑨ 陈束《苏门集序》，高叔嗣《苏门集》卷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3册，第562—563页。

⑪ 姜宝《履庵万公集序》，《万文恭公摘集》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9册，第196页。

⑫ 王世贞《增补艺苑卮言》卷四，明万历十七年武林樵云书舍刻本。

⑬ 《荆川先生文集》卷七。

编选《二妙集》：“初，唐顺之选汉魏至明之诗为《二妙集》，盖取陈献章论诗法与理俱妙以名其书。（万）士和受业于唐顺之，因摘其中七言律诗、七言绝句二体，又益以顺之七言律诗一卷，共为十二卷。唐取杜甫、王维、刘长卿、韦应物、王建、张籍、吕岳七人；宋取王安石、黄庭坚、邵子、朱子四人；元取刘因一人；明取庄昶、王守仁二人。”^①唐顺之的弟子吴维岳、莫如忠及沈鍊等人常在一起“论诗”中“窥妙理”，吴维岳在《初夏值沈五纯甫莫大子良相过论诗得音字》：“删前窥妙理，变后讨遗音。”^②与唐顺之颇有交谊的胡直曾刻《击壤集摘要》（邵雍著有《伊川击壤集》），极力推崇邵雍诗。常州府武进人薛应旂以理学著名，但他的诗歌也颇有特色，崔铣在《题薛子诗稿》中说薛应旂的诗“颤发情理，融会风雅，迨苏、李、曹、刘以下及唐诸家，靡不通贯”^③。与唐顺之等合称“三翰林”之一的罗洪先“远师《击壤》，近仿白沙（陈献章，世称白沙先生）、定山（庄昶，居于定山三十年），然爽气尚存，未愔尘雾”^④。陈田在《明诗纪事》中说罗洪先的“五言诗具有体格，擅清远之致。惟语参讲学，时入《击壤》一派”^⑤。

唐顺之师法邵雍的诗歌大致有两种风貌，一是法理俱妙，气象清爽，如《暮春游阳羨南山四首》、《闻复官报寄京师友人》^⑥等。后者云：“姓名不复挂朝参，鱼鸟由来性所耽。篋里符经都已废，山中药草渐能谙。疏狂自分三宜黜，懒病其如七不堪。深谢故人推轂意，莫将阳羨比终南。”首联出句写退官之人，对句写鱼鸟之性；颌联出句写出世之志已废，对句写山隐之习已存；颈联出句写疏狂之性，对句写懒病之身；尾联出句谢故友推荐之情，对句表自己归隐之志。且环环相扣，曲曲传情。这首诗中关键一句是“鱼鸟由来性所耽”。《礼记·中庸》中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鱼鸟自由往来，纵情玩乐，以物拟人，物我相融。《诗经·大雅·旱麓》中有云：“鸞飞戾天，鱼跃于渊。”孔颖达疏：“其上则鸞鸟得飞至于天以游翔，其下则鱼皆跳跃于渊中而喜乐，是道披飞潜，万物得所，化之明察故也。”^⑦这是说德政惠及万类，也有说万物各得其所。“鸞飞鱼跃”是宋明理学家的一个重要话题，也深深地影响到宋明诗歌的创作，唐顺之则将理学精神融化在《闻复官报寄京师友人》等诗中，而且法理俱妙，气象清爽。二是溺于理学，丧失真趣，俚词鄙语，不调不格。王世贞说：“近时毗陵一士大夫始刻意初唐，精华之语，亦既斐然。中年忽自窜入恶道，至有‘味为补虚一试肉，事求如意屡生嗔’，又‘若过颜氏十四岁，便了王孙一裸身’，又《咏疾》则‘几月囊疣是雨淫’，《阅箭》则‘箭箭齐奔月儿里’，《角力》则‘一撒满身都是手’，《食物》则‘别换人间蒜蜜场’等语，遂不减定山。”^⑧

三是提倡“本色”，直抒胸臆，质朴自然。唐顺之的诗歌创作上有前期与后期的转变，后期转向两个方向，一是理气诗，一本色诗。关于唐顺之的“本色”诗论，最重要的部分见于他的《答茅鹿门知县》二中，其中有云：

今有两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谓具千古只眼人也，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据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其一人犹然尘中人也，虽其专专学为文章，其于所谓绳墨布置则尽是矣，然翻来覆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索其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有也，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即如以诗为喻，陶彭泽未尝较声律、雕句文，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何则？其本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二《二妙集》提要，第1749页。

② 《天目山斋岁编》卷一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5册，第197页。

③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首，《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43册，第5页。

④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一二“罗洪先”条，第330页。

⑤ 陈田辑《明诗纪事》戊签卷一七，第1716—1717页。

⑥ 《荆川先生文集》卷一。

⑦ 《毛诗正义》卷一六，《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影印），第516页。

⑧ 王世贞《增补艺苑卮言》卷四，明万历十七年武林樵云书舍刻本。陈田《明诗纪事》戊签卷九引王世贞《艺苑卮言》，在“遂不减定山”后还有“‘沙边鸟共天机语，檐上梅挑太极行’，为词林笑端”等语（陈田辑《明诗纪事》，第1535页）。

色高也。自有诗以来，其较声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说最严者，无如沈约，苦却一身精力，使人读其诗，只见其捆缚齷齪，满卷累牍，竟不曾道出一两句好话。何则？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况非其本色者哉？^①

此处论本色，既是指文又是指诗。关于诗歌的“本色”论是从正反两个方面说的，正面典型是陶渊明的诗，“信手写出”，自然流畅；反面典型是沈约的诗，“较声律、雕句文”，被唐顺之贬之为“捆缚齷齪”。其实，在唐顺之看来，“本色”的关键在于“直写胸臆”，他在《与洪方洲书》中说：

近来觉得诗文一事，只是直写胸臆，如谚语所谓开口见喉咙者，使后人读之，如真见其面目，瑜瑕俱不容掩，所谓本色，此为上乘文字。^②

“本色”论是唐顺之等人追求的诗歌审美理想。正是在这种诗歌审美理想的指导下，他们的诗歌创作也呈现出“本色”的特征，如唐顺之的《山庄闲居》：

身名幸自谢笼樊，白首为农誓不谖。惯住山中知鹿性，数行树下识禽言。巾车每许邻翁借，书帙间同道士翻。醉后渐看松月下，满村鸡犬寂无喧。^③

在山庄田园的风光中蕴藏着闲情逸趣，纯朴自然，颇有陶诗之风。顾起纶《国雅品》中指出：唐顺之的“古体如云津跃龙，幻变莫状；近体如风涧鸣琴，幽逸有致。五言如《阳羨送白尉》、《金山寺》、《清溪庄》、《赠陈千户》，七言如《寄周中丞张相公》、《赵洲怀古》、《樊医》、《冰灯》、《吴山人》诸篇，格高韵胜，词雅兴新，无句不秀。无字不稳，此即李、何亡蹊舍筏喻也”^④。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中说唐顺之的“律诗质不伤文，丽而有体”^⑤，这是就他律诗中的成功之作而言，如七律《赵州怀古》缅怀战国时以胡服骑射进行军事改革的赵武灵王和善于养士的平原君赵胜，借古喻今，委婉以讽。其中颈联“市上美人挥锦瑟，场中狭客舞青萍”^⑥，在描写赵州古朴的风俗中洋溢着活泼的生气，是质朴与流丽相结合的上乘之作，是明代嘉靖年间毗陵诗派师法初唐兼取邵雍又追求“本色”的一次成功的创作实践。还有莫如忠机杼独出，“其诗清令”^⑦，五七言近体诗，颇有王、孟之遗风。王立道诗风冲雅淡宕，不为奇险之语，颇能入韦应物、柳宗元之门户。《明诗纪事》戊签卷九引《东南峤外诗话》评王慎中的“世事浮云机久息，故园芳草梦空还”、“世态无端争梦里，人生何事胜樽前”等诗句说“蕴籍自然，令人三复不厌”^⑧。杨巍的诗不事雕绘，旨趣天成，《四库全书总目》评其诗说：“盖其中岁学诗，与唐高适相类。而天分超卓，自然拔俗，故能不染埃壘，独发清音。王士禛《池北偶谈》称其五言简古得陶体，为明人所少。又举其‘前年视我山中病，落日独骑驄马来。记得任家亭子上，连翘花发工衔杯’一绝，盖其神韵清隽，与士禛论诗宗旨相近，故尤赏之。”^⑨

对“毗陵诗派”的认定及其在嘉靖前后诗学演变中的意义

对于明代毗陵诗派，人们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早在嘉靖前期，陈束在《苏门集序》中说：“弘治力振古风，一变而为杜诗，而李、何为之倡。嘉靖改元，后生英秀，稍稍厌弃，更为初唐之体，家

① 《答茅鹿门知县》二，《荆川先生文集》卷七，《四部丛刊初编》本。

② 《与洪方洲书》，《荆川先生文集》卷七。

③ 《荆川先生文集》卷一。

④ 顾起纶《国雅品》，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12页。

⑤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一二，第331页。

⑥ 《赵洲怀古》，《荆川先生文集》卷一，《四部丛刊初编》本。

⑦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唐金事顺之”，第402页。

⑧ 陈田辑《明诗纪事》，第1532页。

⑨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存家诗稿》提要，第1509页。

相凌竞,斌斌盛矣。”^①这里着重说“初唐之体”。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专设《诗体》一章,论到建安体、永明体、唐初体、盛唐体、元和体等,从时代风格立论,其中有的属于诗歌流派,如元和诗派等,也就是说“体”与“派”有区别也有相似之处,因而也有人将“体派”并称。陈束说嘉靖前期“家相凌竞”的师法“初唐之体”,多少与嘉靖年间的“初唐诗派”乃至“毗陵诗派”有些关系。

钱谦益(1582—1664)在清顺治三年(1646)至六年(1649)编撰《列朝诗集》,他在《列朝诗集小传》中指出:“正、嘉之间,为诗者踵何、李之后尘,剽窃云扰,应德(唐顺之)与陈约之(陈束)辈,一变为初唐,于是称其庄严宏丽,咳唾金璧。”^②这里着重说“应德(唐顺之)与陈约之(陈束)辈”。“辈”有批、群的意思,因而“应德(唐顺之)与陈约之(陈束)辈”,是从师法初唐者的群体而论的。我们在前文中已经论说为什么这个群体的领军人物是唐顺之而不是陈束,如此便可看清“应德与陈约之辈”与“毗陵诗派”之间有一定的关系。

从明嘉靖前期的陈束到清初的钱谦益,再到清乾嘉时期的诗人吴应奎(1758—1800),他在论诗绝句中论到其祖父吴维岳时说“毗陵诗派早知归”^③,将以毗陵唐顺之为领军的诗人群体视为诗歌流派,这是对明嘉靖前期的陈束、清初的钱谦益有关观点的继承与发展,这也得到了晚清时期陈田(1850—1922)的认同,陈田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至宣统三年(1911)编撰《明诗纪事》甲至辛签,他在《明诗纪事》戊签序中说:“有明诗派,吴下擅于青丘,越中倡于犁眉,八闽工于膳户,东粤盛于西庵,西江妙于子高,各有轨辙,不相沿袭。自茶陵崛起,笼罩才俊,然当时倡和,袭其体者,不过门生执友十数辈而已。暨前、后七子出,趋尘蹊景,万喙一声。其间独照之匠,若荆川、遵岩、震川,变秦、汉为欧、曾,易诘屈聱牙为字顺文从,允矣君子,展也大成矣。”^④从明初五地诗派说到茶陵诗派,从七子诗派说到“荆川、遵岩、震川”等诗派。虽然说明代文学流派往往是合诗歌、古文而言,从诗歌看为诗派,从古文看是文派,但我们在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陈田在《明诗纪事》戊签序中是从“有明诗派”角度论“荆川、遵岩、震川”的,而不是论唐宋文派。看看陈田有关“荆川”(唐顺之)等诗派的观点,也有利于人们对“毗陵诗派”的认同。

从嘉靖前期的陈束、清初的钱谦益、清乾嘉时期的吴应奎、光宣年间的陈田等有关论述来看,在晚清以前诗歌批评史上“毗陵诗派”说已具雏形。我们在上文中已考察领军人物毗陵唐顺之,考察由吴维岳、万士和、姜宝、莫如忠等“唐门弟子”、唐顺之等“嘉靖八子”(“嘉靖十子”)、以毗陵地域与唐顺之结缘的一批诗人组成的群体,考察以唐顺之等群体的诗歌主张与诗歌创作并把握其三大特色:一是诗宗初唐,风格流丽中有精华;二是取法邵雍,追求“法与理俱妙”;三是提倡“本色”,直抒胸臆,质朴自然,因此可以说:明代嘉靖年间活跃着一个颇有特色的诗歌流派——毗陵诗派。

认定毗陵诗派,更有利于我们认清明代嘉靖前后诗歌演变的历史。人们一般认为在嘉靖年间扭转以李梦阳为代表的七子派“诗必盛唐”、复古模拟诗风的主要有高叔嗣和华察等古澹诗派、杨慎等六朝诗派;也往往重视嘉靖年间的“唐宋(文)派”,而忽视“毗陵诗派”。而毗陵诗派是当时诗坛上反对李梦阳为代表的七子派“诗必盛唐”、复古模拟诗风的一支生力军:“正、嘉之间,为诗者踵何、李之后尘,剽窃云扰,应德(唐顺之)与陈约之(陈束)辈,一变为初唐”^⑤;“大抵李、何振委靡之敝而尊杜甫,后冈则矫李、何之偏而尚初唐”^⑥。毗陵诗派不仅有群体的扭转之力,而且有群体的开拓之功。晚明文学解放思想的主将袁宏道十分看重唐顺之等的作用:“有为王、李所摈弃,而识见议论卓有可观,一

① 陈束《苏门集序》,高叔嗣《苏门集》卷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3册,第562—563页。

②⑤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唐金事顺之”,第375页。

③ 吴应奎《读明人诗效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五首》其二十九,郭绍虞等编《万首论诗绝句》,第790页。

④ 陈田辑《明诗纪事》戊签,第1395页。

⑥ 《后冈陈提学传》,《闲居集》之十,李开先撰,路工辑校《李开先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12页。

时文人望之不见其崖际者，武进唐荆川是也。”^①现将唐顺之与袁宏道有关诗学思想作一对照，列表如下：

唐顺之	关键词	袁宏道
近来觉得诗文一事，只是直写胸臆，如谚语所谓开口见喉咙者，使后人读之，如真见其面目，瑜瑕俱不容掩。（《与洪方洲书》） ^②	直抒胸臆	大多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叙小修诗》） ^④
直据胸臆信手写出。（《答茅鹿门知县》二） ^③		信口而出，信口而谈。（《张幼于》） ^⑤
以诗为喻，陶彭泽未尝较声律、雕句文，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何则？其本色高也。自有诗以来，其较声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说最严者，无如沈约，苦却一身精力，使人读其诗，只见其捆缚齷齪，满卷累牍，竟不曾道出一两句好话。何则？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况非其本色者哉？（《答茅鹿门知县》二）	本色	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叙小修诗》）

由此可见，明中期唐顺之有关“直写胸臆”、“本色”等诗学思想对晚明袁宏道“独抒性灵”等诗学解放思想的影响，也可见唐顺之对晚明文学解放思想的先驱作用。当然其中起先驱作用的还有徐渭等。徐渭也提倡“本色”：“世事莫不有‘本色’，有‘相色’。本色犹言正身也，相色替身也。替身者即书评中‘婢作夫人终觉羞涩’之谓也。婢作夫人者欲涂抹成主母，而多插带，反掩其素之谓也。故余于此本中贱相色，贵本色。”^⑥但是，徐渭是“踽踽穷巷一老生，崛强不肯从世议。破帽青衫拜孝陵，科名艺苑皆失位”^⑦，袁宏道说他“名不出于越”^⑧，与被袁宏道称为“一时文人望之不见其崖际者”^⑨的唐顺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谓“一时文人望之不见其崖际者”，应该包括唐顺之领军“毗陵诗派”。正是唐顺之在嘉靖诗坛引领“毗陵诗派”而以群体的力量对冲李梦阳为代表的七子派“诗必盛唐”、复古模拟诗风，并大力倡导“直写胸臆”、“本色”等诗学思想，又以群体的努力付之于诗歌创作的实践之中，因而在对晚明文学解放思想发挥影响方面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作者简介〕陈书录，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发表过专著《明代诗文的演变》等。

①⑨ 袁宏道《叙姜陆二公同适稿》，《袁宏道集校笺》卷一八，第 695 页。

②③ 《荆川先生文集》卷七。

④ 《袁宏道集校笺》卷四，第 187 页。

⑤ 《袁宏道集校笺》卷一一，第 501 页。

⑥ 《西厢序》，《徐文长佚草》卷一，《徐渭集》，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089 页。

⑦ 黄宗羲《青藤歌》，《南雷诗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 1397 册，第 653 页。

⑧ 袁宏道《徐文长传》，《袁宏道集校笺》卷一九，第 716 页。